

世界政治研究

WORLD POLITICS STUDIES

- ◇ 关于建设世界政治学科的初步思考 / 杨光斌
- ◇ 东盟50年：走出边缘地带发展的困境了吗？ / 王正毅
- ◇ 石油是否导致族群战争？ / 唐世平 熊易寒 李 辉
- ◇ 美国民主的衰败与中国道路的崛起 / 谢 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1 总第一辑

《世界政治研究》

WORLD POLITICS STUDIES

学术顾问 时殷弘 杨光斌 黄嘉树 陈 岳 宋新宁

黄大慧 周淑真 蒲国良 陈新明 王续添

主 编 田 野

副主编 尹继武 韩冬临 李 巍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包刚升(复旦大学)

陈定定(暨南大学)

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

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

卢春龙(中国政法大学)

曲 博(外交学院)

苏长和(复旦大学)

王缉思(北京大学)

王英津(中国人民大学)

王正毅(北京大学)

袁正清(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鼎新(浙江大学)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

保建云(中国人民大学)

戴长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何俊志(中山大学)

蒋俊彦(香港中文大学)

刘 丰(南开大学)

马得勇(中国人民大学)

宋 伟(中国人民大学)

孙 龙(中国人民大学)

王逸舟(北京大学)

王正绪(复旦大学)

谢 韬(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可金(清华大学)

周 强(北京大学)

编辑部成员 田 野 尹继武 韩冬临

左希迎 金晓文

李 巍 段占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政治研究. 2018年. 第一辑: 总第一辑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主办.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203-2407-6

I. ①世… II. ①中…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432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郭 泉
责任校对 赵雪姣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257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刊词：推动世界政治研究的 转型与升级

杨光斌

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转型与升级甚至更为迫切，只不过文化迟滞性和思想惰性使得这种迫切性被掩蔽了。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令世界各国备受尊敬、刮目相看的国家，是很多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年轻人的就业目的地，但是很多国人依然在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来“关照”中国，中国好像处处不符合“标准答案”。

应该认识到，来自西方中心主义的“标准答案”是一种阶段性历史。改革开放对谁开放？当然是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不仅要吸纳西方人的投资，还要学习人家的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乃至思想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作为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国际政治学，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比如著名的阶级论、帝国主义论被边缘化，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简称“三大范式”）则无处不在。了解并理解西方知识体系是重要的，否则就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无法和人家对话。但是，一定要认识到，从比较政治学中的研究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转型学范式”，到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范式”，都是为既定的西方国内政治结构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学术范式的形式而维护着西方的国家利益，中国人按照这一套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去研究中国政治、中国的对外关系，事实上在自觉或不自觉强化着他人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来自西方知识体系的世界政治学科（包括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大战略需要。

“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下半程”的判断同样适应于中国的世界政治学科建设。如果说前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是面对西方，现在，中国的大战略突然转向非西方国家，那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所代表的中国国家战略的新布局。“一带

一路”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学科中的显学中的显学，但是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理解多少呢？在中国国际政治与比较政治学界，无论是研究非洲问题的还是研究东南亚政治的，出国留学或者进修的目的地基本上都是美国欧洲，这种现象意味着还是在学习和研究欧美，而不是研究非西方国家，以至于我们的世界政治学科面临着严重的知识短缺。

学界对于“雅万高铁”为什么迟迟不能开工并没有多少研究。这个大案例意味着，对于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巨型国家，我们的知识尚且如此匮乏，对于非洲、南亚次大陆、拉丁美洲等广大的非西方国家，我们的知识积累绝不会好到哪里去，而非西方国家已经是中国的战略利益所在。不同于文史哲这样的人文学科，世界政治这样的社会科学学科必须服务于重大现实战略，这是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反之，其学科发展也是国家战略带动起来的，没有国家战略的需要，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这些学科，因此知识滞后也属于正常现象。“二战”之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以及发展理论的诞生（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均是由美国战略需要带动起来的。20 世纪 60 年代后，美国年轻学者纷纷走向非洲，进入近邻拉丁美洲，前往亚洲，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非西方社会研究，并试图去改造非西方国家。

国家战略需要和学科性质的关系决定了中国的世界政治学科关注的焦点应该有一个大转身。一方面，“存量”知识依然是重要的，因为欧美依然是中国的战略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中国迫切需要知识“增量”，即对非西方国家的深度研究和深刻理解，正如我们有很多美国、欧洲、日本问题专家一样，中国需要更多的非西方国家的国别问题专家。辨识国别专家的基本标准是：第一，要熟悉当地语言；第二，在当地有学术界或者政界的朋友；第三，当重大事情发生后能迅速根据专业的国别知识作出判断。就此而言，偌大个中国，到底有多少非西方国家的国别问题专家？要做到这些，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过语言关，需要更多的人学习西班牙语、法语和阿拉伯语，这就需要课程调整，增加本学科学生的小语种教学。其次，调整留学政策，不能资助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学生前往欧美发达国家，需要亲自到研究对象国去体验、去生活；同时，也相应地需要增加去非西方国家留学的待遇，这是很多发达国家曾经采取过的政策。即使政策层面到位了，中国年轻人还需要一点奉献精神 and 冒险精神，到非西方国家无疑比去西方发达国家要面临更多的困难。

研究非西方国家不但是一种知识转型，更将是我国世界政治学科的升级。中国是非西方国家的典型，研究历史上的中国对外关系就能强烈地感受到，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不管用，比如，怎么能用“国强必霸”的民族国家理论如现实主义理论来诠释一个奉行“天下观”的文明型中国呢？同样，“修昔底德陷阱”针对的是城邦政治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怎么可以用来分析中国

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呢?以研究古巴导弹危机出名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认为中美之间难逃“修昔底德陷阱”,他对中国文明有多少理解?哈佛教授们只关心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有多少理解?或者说他们愿意理解吗?理解中国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发展,而研究不同于儒家文明的其他文明的非西方国家,势必会给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带来更多的挑战。

我们熟悉的关于发达国家的知识依然重要,但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知识更加渴求。就研究发达国家的国际政治学科而言,研究重镇无疑在北大、人大、复旦三大国际关系学院;然而,就研究非西方国家而言,其他大学利用自己的地利优势,已经取得了令人尊敬的成就,使得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就此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问题研究的“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也意味着,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重镇如果没有危机意识,如果不能适时地提供基于非西方国家研究的新知识,如果不能将国际关系研究提升为世界政治学科,其优势地位将会被大大地削减。

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别创办了旨在推动学科升级的学术平台——《世界政治研究》。其前身是2013年创刊的《比较政治评论》。首先,既然称之为“世界政治研究”,在研究对象或者知识来源上,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西方,而应该是世界,尤其是包括中国的非西方国家研究,而且西方研究也应该是一个“新西方”;其次,在研究路径上,世界政治研究至少是国际关系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的一种高度融合,没有这种融合就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基于这两点的“世界政治研究”,应该是知识增长点,也是未来几十年内学术竞争的新场域。

据说,国际问题类的学术刊物已经多达七十种,要在如此饱和的状态下生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办好这份出版物不但有赖于我们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国乃至国外同行的鼎力支持。

2018年2月19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主编的话

中国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并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中当之无愧的主角。正是由于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介入国际事务，中国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深刻地理解世界政治，包括世界政治体系、世界政治秩序、世界政治思潮、世界政治中的规则与规范、世界各国的制度与行为选择，等等。只有在深刻理解世界政治的基础上，中国才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有力的引领作用，承担更加合理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有效的国际公共物品。但目前中国的世界政治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水平还是研究队伍上仍远不能满足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引领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创办的《世界政治研究》应运而生。正如杨光斌院长在发刊词中所言，《世界政治研究》旨在推动学科的转型与升级。具体来说，本刊致力于推广“大政治学”的概念，倡导以世界视野研究重大政治问题，促进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两个学科的交流与整合，并推动国别地区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的结合。本刊希望在此基础上促进中国学术界对世界政治的研究，提升中国的世界政治研究水平。本刊第一辑发表的7篇论文就比较鲜明地反映了本刊的宗旨与定位。

首先，本刊倡导以世界视野研究重大政治问题。国际关系研究当然脱离不了世界视野，国内政治研究也同样需要世界视野。无论是政治制度、政治行为还是政治文化，都有可能受到国际政治体系和世界政治思潮的影响。在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时代，全球化或逆全球化都会在国际关系或国内政治层面产生程度不一的效应。基于世界政治的研究视野，我们不仅可以提出以前没有提出过的研究问题，而且可以为传统的研究问题提供新的解释。

在本辑论文中，《东盟50年：走出边缘地带发展的困境了吗？》一文从世界体系的视角提出了一个东南亚区域研究者很难提出的问题：东盟50年来在制度建设上的成就真的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东南亚各国的“边缘地带发展困境”了

吗?《世界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文则对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即大国权力转移是技术变迁的重要驱动力。《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一文为拉美民主转型的原因补充了一个往往被忽视的变量,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各国汇率水平的调整。这些论文分别引入了由中心—边缘地带构成的世界体系、世界政治中的大国竞争以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汇率安排等世界政治的研究视野,为地区发展、技术变迁和民主转型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

其次,本刊致力于促进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两个学科的交流与整合。国际政治既可能有国内原因也会产生国内影响,而国内政治既可能有国际原因也会产生国际影响。但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两个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相互隔阂的局面。尽管国际关系学学者或者比较政治学学者在一般的意义上往往承认国际和国内的互动,但是在揭示这种互动机制以及运用这种机制分析问题上仍需要很大程度的自觉和努力。我们将打破两个学科之间的藩篱、促进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整合作为核心的使命之一。本刊编委会的组成就反映了我们对这一核心使命的承诺。

在本辑中,《关于建设世界政治学科的初步思考》一文提出世界政治学就是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统合,思考世界政治必须正确认识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石油是否导致族群战争?》一文对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战争间关系的探究,为探究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共同关注的矿产资源和族群战争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广义的理论。此外,《世界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两文也从国际关系学所强调的大国权力转移和汇率制度变量来解释国内政治中的相关问题。无论是采取从国内到国际还是从国际到国内的研究路径,这些论文都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之间樊篱的突破与超越。

再次,本刊积极推动国别地区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的结合。在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下,国别地区研究很难说属于某个学科。在社会科学各个分支学科中,国别地区研究和政治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相对于人文学科这一地区国别研究的传统栖身之地,政治学为国别地区研究的社会科学化提供了一个最为畅通的路径。就政治学的发展而言,国别地区研究也为其理论的创立和检验提供了“试验场”。因此,本刊有意在世界视野下为国别地区研究和政治学理论的结合搭建一个学术平台。

本辑所刊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涉及多个国家地区,不仅包括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研究,还包括东南亚、非洲、拉美和中东这些非西方的国家地区。这些论文将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和相关国别地区研究的深化结合起来。比如,《东盟50年:走出边缘地带发展的困境了吗?》对“东盟方式”和“东盟为中心”的东南亚地

区合作进行了反思。《石油是否导致族群战争?》一文为建立广义理论而采用的案例遍及东南亚、非洲、东欧中亚等多个地区。《全球地缘政治中的中东战略地位变迁》运用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来分析中东在战略重要性上的变迁过程。《美国民主的衰败与中国道路的崛起》基于对福山政治秩序理论的批判,在统一的视角下探讨美国民主和中国道路这两个在美国问题研究和在中国问题研究中分别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在研究对象上,本辑的论文体现对非西方国家研究的特别重视。

基于以上的办刊宗旨,我们希望在林林总总的国际问题研究类刊物中办出自己的特色。诚盼学界各位前辈和同人能够支持和帮助我们,不吝向我们惠赐稿件。我们将坚决贯彻文章质量是选文用文的唯一标准这一核心原则,提倡学术研究自由、鼓励学术观点争鸣、支持学术流派多元,以便为中国早日产生具有原创性的世界政治理论、尽快成为世界政治研究的学术强国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田 野

2018年3月20日

世界政治研究

2018 年第一辑(总第一辑) 5 月 20 日出版

关于建设世界政治学科的初步思考	杨光斌 (1)
东盟 50 年:走出边缘地带发展的困境了吗?	
——对“东盟方式”和“东盟为中心”的反思	王正毅 (20)
石油是否导致族群战争?	
——过程追踪法与定量研究法的比较	唐世平 熊易寒 李 辉 (54)
世界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大国权力竞争如何引发了技术革命	黄琪轩 (88)
汇率水平调整、社会分化与民主转型	
——对智利和阿根廷的比较研究	田野 熊 谦 (112)
全球地缘政治中的中东战略地位变迁	田文林 (146)
美国民主的衰败与中国道路的崛起	
——对福山政治秩序的批判	谢 韬 (164)
Abstracts	(186)

关于建设世界政治学科的初步思考

杨光斌*

【内容提要】 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仅仅关注现状性结构，加之深刻的意识形态偏见与学科壁垒，已经很难满足当下中国的发展需求，因此加快世界政治学科的建设是当下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世界政治学是以比较政治研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统合。“世界”是一个复数的、异质化的概念，因此世界政治需要从经济、地理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加以思考，并正确认识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世界政治史是世界政治学研究的基础，其本质是资本主义驱动的白人优越论进而所建构的白人主宰的国际制度与国家关系演化的历史。分析世界政治，需要充分吸收各主要国家政治史、政治思想史、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民族解放运动史和国际关系史的丰富资源，并加强对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扭转几十年来学界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的局面，建立真正的中国自主性社会科学。

【关键词】 世界政治 国际关系学 整体性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

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显然对本学科的发展现状十分不满，否则就不会有中国学者呼唤“中国气派”或者本土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外也不会出现诸如“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等争论。然而，如果把视野局限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内进行批判和反思，很难建构起脱颖而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学本来是政治学中应用性最强的分支学科之一，但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理论基础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显然已经把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当作思维游戏。比如，进攻性现实主义或者防御性现实主义只不过是突出了“现实政治”

*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的不同层面,二者的争论属于典型的“盲人摸象”之争;而所谓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具有更多的政策分析倾向。这事实上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发展已经陷于困境之中。这当然是国际关系学的危机,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不能对认识现实中的外交政策有智识上的启示,因而一直追求预测功能的国际关系研究更是有点勉为其难。与此同时,基于国际关系学、国别政治、地区政治和信仰政治的事实性“世界政治学科”已经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其教科书式的研究成果就是亨廷顿在1995年出版的、在当时整个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引发极大争议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文明的冲突》)。^①笔者给《文明的冲突》的定位是“21世纪头20年世界政治路线图”。当美国人还处于冷战胜利的大狂欢之中时,亨廷顿预言21世纪最大的趋势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衰落。果不其然,当今西方国家的现实恰好印证了亨廷顿20年前的观点。亨廷顿敏锐的预见性同样体现在其最后一本著作《谁是美国人》中,作者认为美国出现了“国民性危机”,这很好地回答了为什么是特朗普当选总统,同时也回答了为什么欧洲难民危机会导致出现欧洲危机。其他“路线图”式的预测还包括:21世纪之初,将发生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重大冲突——果然在2001年就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2010年前后,中东几个国家将发生重大的政治动荡——果然在2011年爆发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将发生分裂,最有可能从克里米亚开始——果然是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文明上无所适从的土耳其将出现一个政治强人而重新伊斯兰化——果然出现了要搞事实性终身制的埃尔多安总统;2015年前后中国将在南中国海遭遇麻烦——果然是所谓的“南海仲裁”给中国制造麻烦;亨廷顿还正确预言中国将不会以武力主张其利益,中国的规模意味着这个新的参与者对世界的影响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新玩家……凡此种种,都是对世界政治走向的“神预测”,这是那些将中国视作美国的“米尔斯海默式”的学者所无法比拟的。

预测,正是国际关系学一直努力追求却难以完成的工作,究其原因是国际关系学忽略了国家间关系中太多的、太关键的变量。因此,和其他学科,甚至和经济学一样,在学科本身存在病理性结构的前提下,将国际关系学推向科学化的雄心壮志需要节制,尤其是量化工具的使用要格外审慎。如果缺少对现实最基本的认识,量化模型得出来的结论只能离“实存”的世界(the world of being)越来越远,这样的研究进而伤害学科本身的信誉。亨廷顿的世界政治研究从来不用什么量化模型,甚至很少用最基本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那么,如此具有前瞻性的预测是如何实现的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传统的国际关系学依然是重要且必要的,但其重大进展离不开其上一层次的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学科——世界政治。这样说有两层含义：第一，就是世界政治学科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即便如此，也必须认识到，国际关系是国内政治和“信仰政治”的一个结果性或者现状性结构，如果缺少对源头性或者过程性结构的研究与理解而仅仅关注现状性结构，研究者就很难认识现状性结构的本质和走向，从而无法做到对发展趋势的“预测”，正如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在解释现实时所面临的无能为力一样。第二，将国际关系学转型升级为世界政治学科。本文主要是在第二个层面谈论国际关系学与世界政治学科的关系，试图探讨世界政治学科的知识结构，包括国别政治研究、信仰政治研究、地区政治研究和作为世界政治学科的知识基础的世界政治史，提出世界政治学科的学科含义就是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有机融合。

需要提前交代的是，本文是中国语境的产物，是对国内国际关系学学科布局的一种思考，因而其中很多问题讨论是“我们的”而并不一定是“他们的”。作为新议程性质的讨论，本文将可能诱发不同看法，这正是本文抛砖引玉之初衷。没有学术争论，就没有思想的解放，也就没有学科的进步。

一 国际关系学的“时代性”与“国家性”

社会科学具体强烈的时代性特征，作为国际关系学（也称“国际政治学”）的时代性特征更为鲜明。虽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民族国家关系史已经有近四百年，但研究这一历史演化的国际政治学则不足百年的历史。如果说爱德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奠定了国际政治学的雏形，那么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则标志着学科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从此之后，无论是知识来源还是研究范式，“美国学”的身份意识开始深刻影响着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作为“美国学”的国际关系学意味着该学科一方面秉承了大国关系研究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传统，同时美国的国际政治学还是典型的“冷战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历史、去真相的意识形态化的所谓的“科学哲学”，诸如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主宰着冷战后半程的国际政治学。这样，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从一开始就有其时代性约束，何况大国关系根本不是世界政治的全部，大国关系研究事实上掩盖了世界政治的很多真相。比如，专注于中美关系研究就可能忽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问题，局限于中美关系的思维就可能被“美国学”的几个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所束缚而无视世界真相，甚至失去最基本的对公正问题的关怀。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也不属于大国关系，甚至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即使研究大国关系，仅仅研究大国关系中的“政治关系”（即所谓的“国家间政治”）也无法从根本上理解真正的国家间关系。更重要的是，已经作为“冷战政治学”的国际政治学具有鲜明的国家身份，那就

是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肯尼斯·华尔兹为此而不顾一切地为现状性结构辩护并挖空心思地去批评那些“还原化理论”,包括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和列宁主义都一直强调的帝国主义理论。难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的民族国家诞生与扩张,不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逻辑吗?如此赤裸裸的蔑视真实历史、游戏读者心智的学说,居然就这样主导国际政治学十几年。

西方同行对国际关系学现状同样表示不满。比如,在中文世界里流传的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贾斯汀·罗森博格的文章指出,国际关系学依然生存于政治学的囚笼里,政治学的本体论是权力,国际关系学依然没有摆脱权力的话语,因此主张以所谓的“多样性”代替权力而使得国际关系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①“多样性”是个无所不包且不伦不类的概念,这样的提法不会对学科的转型与升级有什么助益。

应该看到,以大国关系研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学,其实质无不展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底色。因此知识,甚至虚假知识的来源,都是论证乃至虚构西方民族国家形成与扩张的历史。国际关系理论必然是依据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经验而量身订制的一套说法,其中掩盖乃至无视的是西方以外的“世界”:既有的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资源仅限于世界的一个极小的但曾经主宰过世界的那部分。这种知识建构的帝国主义逻辑显然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明,应该是我们理解以政治为核心的“世界”的知识来源。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关系学应该、必须转型为世界政治学科。

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国际关系学研究传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所学习、引进的就是这些在学科上存在严重时代性约束、并有着鲜明的“美国身份”的国际政治学。这并非抹杀几十年来中国学界对西方知识学习的成果,所有学科都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不断发展。但是,如果永远以谦逊的学生身份去对待这样一个时代性、国家性都很强烈的理论体系,那么这不仅是这个学科的悲哀,进而甚至是国家的悲剧。要知道,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不是那种只要经济发达就万事无忧的中等规模的国家。相反,作为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巨大的国家,中国基于其自身行为所形成的知识和政治逻辑,对世界政治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是,中国经验在既有的国家关系理论里是缺位的,在中国的语境下,国际关系学需要转型并升级为“世界政治学科”。

如果要准确把握世界政治研究的学科意涵,首先,要理解“世界”这一概念。“世界”是由诸多国家政治构成的,或者说各主要国家的国内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主体,因此世界政治学科视野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研究国内政治。研究各主要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实上就是在研究世界政治。其次,世界政治思潮对世界政

^① 贾斯汀·罗森博格:《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史学集刊》2017年第4期。

治走向和国家间关系发挥重要影响，世界政治的主题不再是传统的基于实力政治的战争与和平，在此基础上更有诸多的“文明的冲突”，信仰和意识形态政治对世界政治的走向影响深远。再次，在知识论上的拓展，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大国关系研究中的大国的知识即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知识，关注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和智慧同样是世界政治研究的应有之义。这些视野上的拓展能够让我们明晰地发掘问题的真相。如果只局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大国关系研究而不关心世界人口中多数人的命运，很难在当今时代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以上表明，即使国际关系学依然重要，依然在学术分工上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但是假若缺乏世界政治学科的关注，那么基于现状性结构的大国关系研究则很难向深入推进，甚至研究成果也仅仅是为“虚假的知识与错误的真理”作注脚而已。

更重要的是，充分认识世界政治学科的内涵和重要性，对于改进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群体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培养，意义重大。在目前的研究生培养体系中，国际关系专业学生的课程和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存在着明显的学科壁垒，政治思想史更是很多学生难以触碰的问题域。通过阅读巨量的历史书籍而形成自己的历史哲学观需要长期的坚持与超群的智慧，这种国际关系学的“大境界”并非一般研究者所能企及。

二 何为“世界”？何为“世界政治”？

突破国际关系学那种以大国关系为核心的、其实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线索的学科传统，需要尽快建立世界政治学科。为什么是“世界政治”而非“全球政治”？全球是一个一体化概念，“全球政治”意味着有一个统一的行为规范和一致性的行为模式。很显然，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形态。

相反，“世界”是一个复数的、异质化概念。世界不是地球，一个地球存在多个“世界”。在经济意义上，不仅有发达世界，也有不发达的世界，即中国人常说的“三个世界”，这其实是“南北问题”，这是世界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并非以大国关系为线索的国际关系学的核心关怀。经济意义上的“世界”必然是不平等、不平衡的世界。中国国际政治研究起源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注，世界范围的不平等问题是分析的重点。但是，“华丽转身”之后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在大国关系的指挥棒下，似乎忘记了“初心”，围绕着“美国学”转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有可能把美国的问题意识当成自己的问题意识，秉承美国的“现实主义理论”而解释世界，忘却了发展的不平等、不平衡这样的事关绝大多数人命运的问题才是世界的根本问题。这样，在对世界的定位上，忘却了“公正世界”正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要追求的，而美国的推广民主战略绝不会考虑到不平等的世界的真正的需求。所以，学科导向决定了问

题意识,也决定了研究对象的真假性、轻重性。

更重要的是,作为复数的异质化概念的世界,在文明结构上,一个文明就是一个世界。世界政治是由不同文明类型构成的,而非以西方中心主义即基督教文明所构成的“普世”——在以大国关系为基础的西方中心主义那里,只有一个世界,即所谓的基督教文明所构成的“自由世界秩序”。且不说其他诸多文明的重要性,在对当下世界造成重大影响的三大文明中,基督教文明之外还有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在复数的世界所构成的世界政治中,文明的和谐也好,文明的冲突也罢,都是世界政治最重要的议程。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政治”也是“信仰政治”;相对而言,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虽然在表面上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但推动权力关系的背后则是“文化帝国主义”。从19世纪到20世纪,“文化帝国主义”不断变换其形式即理论,弄得非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晕头转向,国际关系学因此而掩盖了世界的真相。在地理结构上,作为一个复数的异质化概念的“世界”意味着其自身是由不同的地区和国家构成的,或者说世界政治的单元组织是地区政治和国家政治。即使在同一个地区,比如亚洲,亚洲到底为何物?只是一个地理上的说法而已,在文明结构上显然不同于具有相对同一性的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亚洲由信奉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教的不同国家构成,因此需要从文明意义上理解地区政治。强调地区政治和国家政治作为世界政治的主体,意义还在于突出我们关于世界政治的知识上的结构性缺失。对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而言,对欧洲、美洲的理解甚至多于对亚洲本身的认识和理解,更毋宁说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理解了。

无论是文明结构上还是从地理结构上理解世界政治,目的都在于讨论知识论问题:我们是因为他人的重要问题而研究,还是基于主体性需要而研究重要问题?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就是“他人”的重要问题,而以大国关系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学显然不能满足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知识需求。只有基于文明结构和地理结构上的世界政治研究,才可能满足中国的战略需求。

因此,讨论什么是“世界”以及为什么应该是“世界政治学科”而非传统的国际政治学,就是因为“时代性”的变化。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规模巨大的、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同时又处于对世界的理解严重的知识短缺状态的中国,需要一场认识论上的革命,需要一场知识革命。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都需要一场知识革命,而政治学科群中的国际问题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首当其冲,因为社会科学最古老的基础学科就是政治学。

明白了“世界政治”的含义,对世界政治学科的建制才得以展开。世界政治学科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作为“强学科”本身的世界政治研究。这意味着世界政治研究是比国际关系学更为宽广的一门学科,不但包括传统的国际关系

学，还包括国内政治、“信仰政治”、地区政治与世界政治。“强学科”的世界政治研究的经典成就就是前述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很难在当今学科划分的背景下将亨廷顿给予身份定位——无论是国际政治、美国政治抑或是比较政治——最恰切的定位就是世界政治学者。“一体化”是“强学科”的最一般特征。“一体化”或者“一般化”研究，事实上是在回归社会科学领域细分之前的传统，正如很难说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是什么学科的学者一样。第二，作为“弱学科”的世界政治研究。这种定位意味着，“世界政治”至少是各分支学科的不可或缺视野。也就是说，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国别政治、比较政治研究，都离不开世界政治的关怀。比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当初之所以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失范”，就是因为一般学者没有“信仰政治”这种世界政治思潮的观察；再比如，很多人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乃至其价值，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世界范围内比较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就国际关系学而言，“弱学科”的世界政治研究，至少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所具有的比较政治视野，需要做到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一体化研究。

世界政治学科的提出还有其他内涵，比如超越“美国学”的“身份意义”。中国已经接近国际舞台的中心，属于全球化的中心地带，知识供给必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而不再是围绕特定“思想供货商”。这就意味着，中国学者不但要首先研究作为国别政治的本国政治，还要根据中国战略利益需要而有优先顺序地研究地区政治，研究影响国别政治和地区政治的信仰政治。当然，首先需要建构起作为学科基础知识的“历史学”——世界政治史。

三 作为世界政治基础的国内政治

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相辅相成，但更多情况下国内政治对对外关系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国际关系研究首先要研究相关的国内政治。

“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这一看法如今在知识界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在全球化的“世界时间”里，国内政治同样受制于外部环境，尤其是那些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中小型国家。然而，当下中国政治学界内部的问题在于各子学科间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交流：研究中国政治的不研究对外关系，充其量看看国际新闻；研究中国外交的不研究，甚至不关注中国国内政治发展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直接影响。这种形式上的“分工”究其原因是碎片化的知识体系与狭隘的学科意识所致。众所周知，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是内政、外交一体化的研究，这当然与他们所受学科训练有关，比如读博士至少得修两个分学科的课程，以国际关系研究为主的，必须修政治学理论专业或者比较政治专业，这种学科规范至少保证了研究者的基本知识需求。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学学科的博士生培养中，